

● 新闻传播

西学东渐大潮中的反向文化传播

卢素琼, 祝远德

(广西大学 外语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作者简介] 卢素琼(1964-), 女, 江西南康人, 广西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讲师, 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 祝远德(1958-), 男, 广西平南人, 广西大学外语学院英文系副教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摘 要] 在跨国文化交流与传播中, 一定时期的文化主流向是由强势文化地区流向弱势文化地区。从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四十年时间, 中西文化交流的主潮是从西方流向中国。但是, 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单向流动, 在西学东渐大潮下, 中国文化向西方的逆向传播, 也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 文化传播; 西学东渐; 辜鸿铭; 林语堂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4-0502-05

一、概 说

鸦片战争的失败, 标志着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打碎了那些以为从西方引进技术就可以富国强兵的人们的梦想, 人们终于认识到, 引进西方的技术而不相应地引进西方的文化观念和社会体制, 是不可能挽救中国的命运的。于是, 中西文化交流一改只重科学技术的做法, 开始引进西方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1898 年,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T. H. Huxley)的 *Evolution and Ethics*, 以《天演论》为中文书名出版, 标志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 相继推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中文书名为《原富》, 1901—1902 年分 8 册出版), 穆勒(J. S. Mill)的 *On Liberty* (中文译为《群权界论》, 1903 年出版)等一大批西方的思想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 试图用西方先进的思想理论和文化, 对中国国民进行启蒙, 以拯救处于民族危机之中的中国。

社会科学作品的引进及留学生的派出和学成归来, 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观念。几乎与《天演论》同一时间, 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 拉开了大量引入欧美文化作品的序幕。林纾本人不懂外文, 却先后和魏易等 19 人合作, 翻译出版了英、美、法、俄、德、日本、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挪威等 11 个国家 98 位作家的 159 种作品, 这还不包括翻译而未刊印的 23 种作品。文学作品的引进, 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准备了条件。1916 年开始的文学革命, 从文字和文学创作的革命两方面同时进行, 标志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而这些文学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中的许多人, 如鲁迅兄弟、郭沫若等人, 都深受林译小说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林纾翻译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而林纾本人却变成了反对使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的保守派。

从《天演论》的出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为中国共产党定为党的指导方针,进而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赢得国家政权,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都是西学东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主潮。在这期间,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各国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东西方力量的对比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比较而言,西方仍然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而整个东方仍然处于弱势的地位。中国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与西方相比,自然也处于文化上的弱势地位。所以,整个20世纪上半时,实际上都是中国有识之士探索把西方的理论用于中国的实践,试图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文化交流走向,自然是引进大大超过输出,形成一个西学东渐的主潮。就中国学者而言,辜鸿铭和林语堂的相继努力,功不可没;就西方学者而言,许多汉学家,尤其是德国的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的引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辜鸿铭和林语堂的传播

辜鸿铭和林语堂是两位有相似背景的学者。辜鸿铭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第233页)。辜鸿铭185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辜鸿铭10岁时,英国商人布朗夫妇把他带回英国,给他提供良好的西方教育,还让他到德国上大学,到巴黎游历。直到1878年,辜鸿铭才结束了西方的学习生涯,回到马列来西亚。而他回到中国,更是1885年以后的事。林语堂虽然不生在国外,却也出生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从小就在基督教的气氛中长大,他和辜鸿铭都有一个西方文化氛围的起点。

辜鸿铭在西方文化氛围中长大,从小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直到他回到马来西亚以后,在新加坡遇到了既精通西学,又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功底的马建中,在后者的影响下,才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决心好好地研修中国文化。于是,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中国。1885年,辜鸿铭应聘在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中任职。林语堂出生于1895年,虽然从小学习四书五经,但1904年进入厦门鼓浪屿教会小学读书,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911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后,几乎全部中断了中文的学习。1919年前往美国留学,第二年因留学费用被取消而转到法国,最后于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1936年应赛珍珠之邀再次赴美,凭借自己的英语写作水平,全心全意地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

由于在西方文化熏陶下长大,回国以后才学习中国文化,辜鸿铭的中国文化功底的扎实程度常常受到国内学者的怀疑。而在国外,他却享有极高的声誉。辜鸿铭之所以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是因为他觉得由西方传教士等汉学家介绍的中国文化,许多都是译介者凭着自己的想象,随意歪曲中国文化的本来意义。由辜鸿铭翻译的儒家经典《论语》(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于1898年出版和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出版时间碰巧都在同一年。他翻译的《中庸》(The Conducts of Life)于1906年推出;《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于1915年和读者见面。从时间上看,辜鸿铭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过程,正好是西方文化大量被译介、引进到中国的时间巧合。除了《论语》(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的出版时间与《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都是1898年外,《中庸》(The Conducts of Life)的出版时间比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晚一年,《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比中国的文学革命开始时间早一年。林语堂“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主要是在1936年至1966年应赛珍珠的邀请到美国定居期间从事的。即在辜鸿铭去世8年以后,也可以算是辜鸿铭传播中国文化努力的继续吧。实际上,林语堂影响最大的两本书《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都在20世纪30年代推出,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版。林语堂曾经很激烈地反对过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所处的弱势地位,赞同过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来启蒙中国人。虽然后来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改变,但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时显然失去了辜鸿铭式的自信和顽固保守的立场。他不像辜鸿铭那样妄想用中国文化去教训西方人,而在写作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西方人的接受习惯,甚至有意迎合西方人的欣赏趣味。

比较而言,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感,几乎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所以,

他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去纠正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偏见。他宣称,“智慧只能在孔子圣典范围内找到。”^[1](第 248 页)1920 年会见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时,辜鸿铭激烈地批驳了西方文化胜过中国文化的论调。

但由于对中国文化良莠不分,辜鸿铭往往把糟粕当做香花。在大家纷纷剪掉辫子的时候,他却留起了辫子,而且还得意洋洋地称之为“傲霜枝”。他以老大帝国最后的传人自居,一身打扮也非常奇特。“枣红色的旧马褂,破长袍,磨得油光闪烁,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痕迹,平顶红结的瓜皮小帽,帽子后而一条久不梳理的小辫子,瘦削的脸,上七下八的几根黄胡子下面,有一张精通七八国语言,而又极好刁难人的嘴巴。”^[2](第 130 页)林语堂则以一种潇洒的态度,“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的策略是“你有你的美好处,我有我的美好处”要“以己之长,补人之长”。有人说林语堂用一双汉学家的眼睛看待中国文化^[3](第 18-22 页)。因此,对他中国文化的判断力就多少值得怀疑。实际上,他把一些并不是美的东西加以美化。“他对儒家的颇有幼稚的美化和‘浪漫崇拜’,足以体现作为一个未受半点儒家教义和规约束缚、‘压迫’过的局外人的非常单纯的认知态度。”^[3](第 18-22 页)

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辜鸿铭凭借自己深厚的西方语言和文化功底,在西方有着巨大的影响。辜鸿铭不仅把儒家经典翻译成英语,而且还用英语写了很多东西。比如,1900 年他为慈禧太后辩护而用英文写的《尊王篇》是欧洲人争相阅读的作品,大量发行,大有“洛阳纸贵”的味道。他的《中国牛津运动故事》(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在德国影响很大。德国人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曾把它从英文译成德文,标题为《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这本书是成为古廷根大学(University of Göttingen)哲学系全体师生的必读书^[4](第 99 页)。此外,辜鸿铭还和当时世界上许多著名人士有交往,如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毛姆等。辜鸿铭还和泰戈尔同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当时有报纸曾称:“除著作为欧美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4](第 100 页)林语堂在国外也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都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和辜鸿铭一样,他也曾经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 1975 年,林语堂在维也纳举的第 41 届国际笔会上被选为国际笔会总会的副会长。

另一方面,由于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执着甚至顽固的坚持,他为之辩护的许多东西是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加上他自己的独特形象,他又成了“他者化”的形象代表。尽管他不遗余力地传播中国文化,但他的知名度越高,这种“他者化”的形象的影响也就越广泛,造成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的文化误读也就会误会越深。辜鸿铭自誉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虽然他的这种身份在国内从来没有得到过承认,但是,国外无疑会有许多人承认他的这种身分。殊不知,如果以他的形象作为中国人的代表,与普通中国人的形象比较,相去何止千里!林语堂不是由于自身的形象,而由于他的“汉学家”的眼睛,由于他对西方读者接受的考虑,“他谈儒家、谈道家、谈中国文化,我总觉得隔着一点什么,好像在原来事物的表面涂上一层釉彩似的。”^[5](第 267 页)一句话,辜鸿铭以自身的怪诞形象和身体力行,客观上成为文化“他者化”形象的代名词,林语堂则在写作中有意无意地为“他者化”形象添枝加叶。

可见,辜鸿铭和林语堂是两位背景相似、精神相通的学者,他们在西方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独特形象和传播方式,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三、反向文化传播的背景分析

在 20 世纪初期西学东渐大潮中,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文化反向传播小高潮,是有原因的。一是传播者的西方文化背景和他们融贯中西的能力,使西方人接受起来不觉得有语言甚至文化上的隔膜;二是从 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世界经历了两场迄今为止最残酷的大战。这两次世界大战空前惨烈,战争机械

对人的生命的剥夺以及人的生命在战争机器面前的脆弱,使得许多西方人不得不反思造成这种后果背后的原因,而且也有人探索,世界上有没有某种哲学观点可以弥补西方流行的世界观方法论所固有的缺陷。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战败告终。“战败后的德国人悲观失望,德国人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行将覆灭,凯瑟林等人则力赞东方的精神文明,德国青年运动团体则竞相尊奉孔子、老子和释迦等人为导师。”^[5](第99-104页)在这种语境下,德国人发现了辜鸿铭,人们纷纷把他的英文作品和译作翻译成德文。“计有:纳尔逊(Nelson)译的《哀诉之音》;特茨米兹(Oscar A-H-Tchmitz)译的《中国民族之精神》,卫礼贤译的一本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5](第99-104页)。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的贡献不仅在于翻译了辜鸿铭的作品,还在改变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于1899年到1921年间在中国青岛传教,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回国后,他被聘为法兰克福大学的汉学教授,创立了中国学社,致力于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他撰写了《中国心》(1926)和《人与存在》两部专著,还历时十年,翻译了《易经》。通过卫礼贤数十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还有‘黄祸’之感的话,那么在这之后,中国文化通过卫礼贤的传播,人们感到欧洲需要东方哲学,并以此来充实欧洲人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精神世界遭到了创伤,人们更是向往东方文明古国及其文化,并期望借助中国文化和智慧恢复和振兴本国文化”^[6](第67页)。与卫礼贤同时代的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佛尔克(Alfred Forke, 1867-1944)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卫礼贤一起开创了德国的中国文化研究的繁荣局面。

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决不仅限于德国。战后的欧洲,人们对文化的反思是普遍的,文化危机感也不是个别现象。“大战结束后,欧洲人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人们开始推崇中国文化。可见世界文化已进入了大综合时期,尤其是战后初期,欧美所出版的世界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有的叙述史实,有的阐发理论,无不把中国、日本、印度的材料列为一章或数章的。战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尤其对德国,是与西方对辜鸿铭的崇拜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分不开的。”^[5](第111页)

美国与欧洲的情况有所不同。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都没有烧到美洲,虽然美国也参与了世界大战,而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毕竟是有区别的。美国觉得不满足的是,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会上,美国没能争到国际联盟的领导权,因而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巴黎和会的协议。但是,作为战胜国的一员而本国又没有受到战火摧残的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的要比失去的多。美国在二三十年代经历了一个经济繁荣期。在这样的语境下,人们虽然也对战争失去了幻想,但没有多少人觉得有必要对西方文化进行反思。因此,林语堂1936年来到美国传播中国文化,显然不像辜鸿铭那样会一拍即合。

当然,这并不表示美国人对中国不感兴趣。中美文化交流虽然始于鸦片战争前,但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交流的规模都远远赶不上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美交流迅速增加,美国的汉学研究也脱离了欧洲的传统,建立了自己的模式。美国是一个很讲实际的国家,虽然也把中国古代经典如《道德经》、《诗经》、《论语》、《荀子》等译介到美国,但他们的研究方向更注重现实。1925年成立的太平洋学会,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走出了古典研究的小天地,开始对中国的现实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所以,如果说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引入中国文化是出于精神上或哲学上的目的,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则主要是由于现实的目的,与他们当年要求中国“门户开放”的目的是一致的。

林语堂在美国的文化传播,正好迎合了美国人对中国人本身的现实了解的需要。刚到美国的时候,当地人问林语堂女儿的一些问题,完全是一些文化误读产生的疑问:“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的身后没有辫子吗?”“你吸鸦片吗?”“在中国有车吗?”一方面,这些问题使人感到文化误读的程度,其中有没有辜鸿铭的“功劳”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美国人对现实的中国更感兴趣。实际上,林语堂在美国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是《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都是有关现实中普通人中国人及其生活的。这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了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由于作者充分考虑到美国读者的需要,加上他诙谐幽默的文风为美国人所喜闻乐见,《吾国与吾民》才能够一推出就排在美国当年畅销书的首位。而《生活的艺术》自从 1937 年问世以来,已经再版 40 多次,对中美文化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凭借雄厚的实力,执西方汉学研究的牛耳。

虽然 20 世纪初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特点是西学东渐,但同时也有文化反向传播的高潮。著名学者辜鸿铭和林语堂的突出贡献,加上西方在世界大战后对欧洲文化的幻灭感,以及美国人对现实中国了解的愿望,共同促成了这次文化反向传播的高潮。在进入 21 世纪后,全球一体化语境下的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此时再回首 20 世纪初期的反向文化传播,可以更好地认识文化交流的由高向低流的主要特点,同时也可以看到,即使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反向文化传播仍然是可能的,不要低估了文化双向交流的重要性。

[参 考 文 献]

- [1] 李喜所. 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 3 卷[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 [2] 杨念群. 辜鸿铭现象的起源与阐释:虚似的想象抑或历史的真实?[J]. 浙江社会科学,2001,(2).
- [3] 周 可. 林语堂与辜鸿铭:在中国寻找传统—析林语堂文化心态之一[J]. 长白论丛,1996,(3).
- [4] 李道振. 辜鸿铭与东学西渐[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6,(2).
- [5] 子 通. 林语堂评说七十年[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 [6] 何 寅,许光华. 国外汉学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车 英)

Reverse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gainst Mainstream from West to China

LU Su-qiong, ZHU Yuan-de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Guangxi, China)

Biographies: LU Su-qiong (1964-), female, Lecturer,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Guangx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nglish teaching; ZHU Yuan-de (1958-), Associate professor,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Guangx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bstract: In certain period, the mainstream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always from the more advanced party to the less advanced one. The period over 40 years from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beyond any doubt, the mainstream is from the west to China. Howev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never one-way,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 cultural dissemination; spread of Western studies to China; GU Hong-ming; LIN Yu-tang